

文化人



丰子恺笔下的过去乡村。

编者按：本周，《文化人》周刊收到了读者王淦生的一封来信。在信中，他以自己的经历，直言乡村教育的凋敝和落寞。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乡村教育则呈现另一幅景象：许多知识分子下乡，进行乡村教育改革试点，乡村的文化教育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回望过去，今人应能得到有益的启发。

●读者来信：

乡村教育该往何处去？

文/王淦生

高考结束后，领导让我们到一所位于城郊的普通高中去充任监考——那里今年设了一个中考的考点。来这里考试的都是周边地区乡镇初中的学生。接触考生时，对我触动最大的，是这些十五六岁孩子的神情：他们显出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落寞、麻木甚至愚昧。他们看人时那种空洞的眼神和不屑的表情让人内心深处有一种隐痛。

更为可悲的是，开考铃敲响之后，考场中三分之一的人在填好考号、姓名后便趴到桌上呼呼大睡——他们甚至连作弊的欲望都没有，你唤醒他便是惩罚他。所以，我们监考便是看着三分之一的考生睡觉，三分之一的考生枯坐。一个考场30名考生中认真答题的绝不超过10人。

在与送考老师的交流中得悉，如今的乡镇初中大多处在一种风雨飘摇的状态中。优秀生源和优秀教师都被城里的学校吸走，剩下的学生大多是一些留守儿童和学习上有困难的同学，留守的老师也都是一些年龄偏大或教学水平平平的教师。

很怀念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有识之士发展中国乡村教育的情景。那时很多著名的学者、作家——诸如叶圣陶、夏丏尊、丰子恺、晏阳初等人都曾是中国乡村教育的先驱。当时，他们都是怀着一颗“救国”之心来发展中国乡村教育的，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曾有过红红火火而又如诗如画的乡村教育场景的描绘。至今读来，依然令人心驰神往。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乡村教育也曾有过如火如荼的阶段，记得我大学毕业后就曾在一所乡村中学整整待过10年。弥漫在校园中的那种清新、纯朴、向上的氛围，让我在日后遇到种种挫折和坎坷时，不时冒出“不如归去”的念头——可是，最近我才知道，那所乡村中学也已离关门不远。这是不是中国乡村教育的一个缩影？

中国乡村教育的式微应该说不是“钱”的问题。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和改革之初都不会比现在“有钱”。但为何我们的农村富裕了，我们的乡村教育却呈现出一种颓势？我们如何才能将那些在考场上呼呼大睡的学子唤醒？（原信有删节）

（作者为江苏省盐城市亭湖高级中学教师）

八九十年前，乡村啥模样

时光回到将近一百年前，“五四”时期，对于救亡图存的主题，知识分子们产生了分歧。他们一部分主张革命，一部分坚持改良。在这些坚持改良的知识分子里，既有以胡适为首的“独立评论派”，希望立足城市，通过学术与教育引导国家走向现代化。也有以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有感于农村的凋敝与农民文化水平低下，他们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

新中国成立前，乡村建设运动最辉煌的时期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在这十年里，先后有600个团体或机构在1000多个实验点建立了乡村改造实验区。

本报记者 张亚楠 陈玮

海归精英下了乡

乡村建设运动的繁盛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十年里，是有其原因的。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经济暨工业化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同时也是城乡差距拉大的十年。工业的累积来自农业，城市的发展以乡村为代价——这是迄今为止也没有改变的规律。

那个时候，农民靠天吃饭，一旦碰上灾年，农民很容易陷入绝境。而米、面、布等国外初级农产品的倾销，让农民有收成没收入，即使在风调雨顺的年岁也赚不了钱。乡村凋敝触动了很多有识之士，他们各自选择教育、实业、社会管理组织建设等方式振兴乡村。

1926年，晏阳初开始着手在河北定县推行平民教育。在此之前，晏阳初曾经在上海、烟台和通县等地做过一些实验，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步履艰难的晏阳初在北京遇到了同样在故乡实验改革中遇挫的定县乡绅米迪刚，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将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实验转移到河北定县。1929年，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全部迁移到定县。

定县距北京两百多公里，当年乘火车要六个多小时。但在晏阳初眼里，这六个多小时“实在是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时间”。因为热衷于乡村建设的晏阳初不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从小接受西方教育，

有着长期国外生活的背景，是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学士、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硕士。跟随他而来的农业、社会学、医学等方面专家也都是海归知识精英。

平民教育总会的生计教育主任冯锐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负责做社会调查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硕士李景汉；负责乡村工艺部的是美国艾奥瓦大学博士刘拓；从法国留学归来，在新闻界以“副刊大王”著称的孙伏园，是平民教育总会创办的《农民报》主编；哈佛大学博士熊佛西，来到定县编制了大量农村戏剧；另一位哈佛大学博士瞿士英任文学部干事，是平民教育总会中工作最长久的成员。这些洋博士原本都有体面的职位和丰厚的收入，但他们很多人都拖家带口来到了农村。

晏阳初的“四大教育”

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从扫盲教育入手，首先在村中开办了平民识字班。随后全面推行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这四大教育针对的是晏阳初眼中的中国人“四大病”：愚、穷、弱、私。

文艺教育方面，晏阳初致力于平民文学、艺术教育和农村戏剧。他们编辑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和《农民报》，推广学习简易认字教材《千字课》。通过建立广播站、成立农民剧团等，加强科学知识的传授。

生计教育方面，他们设立了生计巡回训练学校，培养“表证农夫”，起到示范带头作用。晏阳初看到农民要忍受高利贷的盘剥，春播需要资金时，农民要去借高利贷，秋收之后，为还债又不得不低价出售谷物。于是，平民教育总会帮助农民组织起农民经营信用社，洽商银行以低息给农民贷款。收获季节时，则组织起运销合作社，直接将粮食运往碾米厂。

卫生教育方面，晏阳初致力于保健制度的建立，设立村、区、县三级保健制度。晏阳初亲自担任村保健员，为农民治疗沙眼和皮肤病，布种牛痘及猩红热预防针。他们还训练助产士代替旧式产婆，引导旧式产婆洗手、剪指甲，改善卫生。

公民教育方面，晏阳初设计了一套从村到乡到县的公民自治和权力制衡体系。但制度上的改革明显比帮农民识字难得多。

晏阳初的定县实验引起了国民政府的关注，他们专门派官员去定县考察，晏阳初也被邀请到南京中央军校高级班演讲，介绍定县经验，蒋介石亲临听讲，并对定县做法予以高度肯定。但晏阳初也感受到了真正改变农民命运的艰难，1937年他在《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中说：“农村经济问题中最严重的，莫如土地问题。”而这项工作牵涉到社会制度的变迁，显然并非一个社会团体力所能逮。

（下转B02版）



设计：
洪波工作室
设计：
壹纸工作室

编辑：
石岩
组版：
颜莉



报纸没看够？想和记者、小编直接对话？快加入“新文化人读者交流群”437864601，我们一起侃文化！

电话：96706056
邮箱：qlwbwenzhuren@163.com